

试论晚清四川彩票总公司的设置及运行

刘力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重庆 400047)

摘要: 本文根据所存留的相关档案资料,以四川彩票章程的规定、四川彩票总公司的机构设置为中心进行梳理介绍,凸现晚清彩票拟欲实现发行制度化的建构尝试,揭示中国近代彩票由简单、零星、无序逐渐走向制度化的过程。

关键词: 晚清;彩票发行制度;四川彩票总公司;四川彩票章程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9)03-0086-06

“彩票”对中国而言是舶来品。19世纪80年代之前,在中国行销的大多是外来彩票,其中以吕宋票为首^[1]。清末同光年间,一些义赈团体为着助赈急需,仿效吕宋票而设“变资助赈彩票”,这被视为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萌芽。早期彩票因以“为善”“义赈”为首要关怀,故得到社会民众的认同,乃至官府的默许^[2]。

随着彩票由舶来品到本土化的转化,彩票的开办也逐渐由义赈人士的民间倡办,到由职商缴饷承办,继而发展为地方官府主办争办。随着晚清彩票开办主体的演变,其发行方式也经由仿效西洋吕宋票到构建起具有本土特色的发行制度,这尤其体现在官办彩票的发行过程中。本文拟根据四川档案馆、明清第一档案馆所存留的相关档案,以四川彩票总公司的机构设置以及四川彩票发行章程的内容为中心进行梳理介绍,以管窥晚清彩票发行制度的建构尝试。

一 晚清四川彩票略述

依据现有档案可知,至迟于光绪十五年(1889),在四川合城(即今重庆合川)就已出现货物彩票^①。这些货物彩票由一些“不肖奸徒”所造,往往以价值

千金或数百金的货物制为数百彩,每票一张,售银二三两至四五两不等,并设头二三四五等众彩,标以极丰美之货物。由于人情“趋利如鹜”,咸欲“孤注一掷”,以致“举国若狂,效尤接踵”,以至出现一些本无货物,“暗以八折或六折折钱者”,亦有“票注上货”,事后以“烂劣不堪之物搪塞者”。然而,这些货物彩票一出现就为地方官府所不容,川东道“风闻渝城近有各行买卖贪利之徒,兴设彩票,立定输赢,名为销货,实与赌博无异,若不严行禁止,必致滋生事端”,遂以“稍涉诡诈,有坏市风”,“事既类于赌博,情复近乎诬骗,属不成事体”为由,予以严禁,违者治以“花会赌博之罪”^②。

遭此严禁,货物彩票很快改头换面。为增强隐蔽性,先前的货物被直接更换为银钱,“近又变本加厉,改为每票一张,售钱千文或银一两,其票数自数千张以至一二万张不等。专于赌赛银钱,与从前仅售货物迥然不同”。对于这“实属目无法纪,大干例禁”之行为,重庆府再次采取了严厉措施:其一,声明所有彩票一项应从此“永远禁革”,已卖者即“将已卖所得钱文退还原主”,仍将已卖票数及未卖之票立即“尽数销毁”,这样可免治罪;其二,一方面出示严禁

收稿日期:2008-12-20

基金项目:本文为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基金(编号:07XWB032)科研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力(1975—),女,重庆奉节人,历史学博士,编辑。

之令，一方面派差严密查获；其三，严惩查获之人（无论买者还是卖者及提供场所者），一经查获到案，“卖票与买票之人均照广东花会赌博例究办”，其开彩处所监保房主，亦“照窝赌例惩治”，所有彩票钱文“全数追缴，作为地方公用”^③。

“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在重庆府的合川南津渡，出现借义渡开放之名设立彩票集众招股之事。县长斥之为“假公济私，实属大干例禁”，一方面专札飭令严查，将开放彩票之何长顺、唐敦元诸人押解回州“照凭究办”；一方面飭令“存有南津渡所发彩票代收钱文，赶紧退还本人，存票缴案”^④。

由上可知，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四川地方官府基本上与全国同步，对以逐利为目标的各色彩票采取了严禁之策。同时，因其时尚无针对彩票的专门禁令，故一般将其与广东花会等同视之，治以赌博之罪。

随着此后江南一带义赈彩票的兴起，彩票在晚清中国几近家喻户晓。由于租界洋商彩票公司的出现，作为“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再度成为晚清彩票的中心市场。庚子赔款为晚清彩票的多名目发展提供了极好契机，以张之洞为首的各省督抚纷纷请设“善后赔款彩票”。至此，晚清彩票也由先前的民间倡办，到由职商缴饷承办，继而发展为地方官府主办。

当此之际，四川当局对彩票也由先前视为洪水猛兽转而思量开办之策。1902年，四川商矿局官绅严卜琴观察有见于外省彩票入川，利源外溢，于是商恳署臬司曹观察奏陈核办彩票。尽管终因奉帅（岑春煊）谓“恐难生弊端”而搁置，然其“缓办可也”^[3]的批语，表明四川当局已不像先前那样拒斥彩票。究其根由，一方面在于其时彩票已家喻户晓，而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些权倾一时的大人物们纷纷置身其中，这无疑为其他省份的督抚们提供了得以效法的榜样。另一方面，彩票成为“新政”筹款的途径之一。自庚子事变之后，晚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局势，宣布实行“新政”。这样，继庚子赔款之外，摆在各省督抚面前的则是随着新政各项内容尤其是经济事业的逐步展开而在在需款的现实。在这一时局之下，继“善后赔款”彩票创设之外，又多了“新政筹款”的请设名目。而且，随着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彩票市场几近饱和，这一时期的彩票有向内地省城发展的趋势。四川彩票总公司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炉的。

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向朝廷奏报川省开办彩票之理由两条。其一，他省彩票均已销售来川，虽经严禁，而“狡诈百出，仍不克密相买卖”。结果是川民购买他省彩票，不仅导致川财虚耗，且徒坏市风，“与其坐视愚民耗伤，何若竟由公家开办”，川省当局兴办彩票，乃是“鉴于湖北彩票盛行于川，利权外溢而不能禁”^[4]。其二，彩票本非善政，而官办可挽利权，“官为举行，利不旁溢，顺輿情以流通商界，挹众羨以接济公需”。既然“各省开办彩票原为不得已筹款权宜之计”，而今创设四川彩票总公司，实属“庶川财仍还之川民，而于筹款亦不无小补”，并声称，“如获盛余，拟即拨归练兵制械之用”^⑤。

在内忧外患、财政难敷的困境中，清政府对各督抚奏设彩票之请，无论是何种名目，均只能一一允准，四川督抚的请设也概莫例外。1905年，四川彩票总公司在省府成都成立。四川彩票总公司不仅制订了完善的彩票章程，还构建了完善的彩票发行机制，标志着晚清四川彩票经历了民间倡办、职商缴饷承办到官厅主办之过程，并已建构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彩票发行制度。

二 四川彩票总公司的机构设置

中国近代自吕宋票传入中国，至四川彩票总公司创设之前，其间涌现出的本土彩票、外洋彩票可谓层出不穷。近代各类媒体广告也刊载了各类彩票章程。总体而言，这些章程零散而不成熟。就现在可知的档案亦或是报刊资料来看，惟有四川彩票总公司的创设，突破了这一现状，首次制定了晚清第一个最为正规最为完备的彩票章程。

依据该章程，四川彩票总公司建构了一套完善的彩票发行机构（参见表1）^⑥。

表1. 四川彩票总公司机构设置一览表

名称	编制(名)	职责
收支所	4(委员1,司事3)	经管本所银钱出入,造报一切等事
文案所	3(委员2,司事1)	经理上行、下行、平行公牍及各处电信各件
编核所	26(委员2,司事24)	以19名编印每期彩票号码,以4名按日核对编成之票,核毕交由委员逐张查核;再于司事内选举1人领班,专管印造所交来白票,并随时照料一切事宜。

管票所	5(委员 1, 司事 4)	分管收发票张及省外各处来往函件、凭单、发单(网)簿,清提中彩票根,及核算中彩银数等事
售票所	4(委员 1, 司事 3)	经管省内给领各商票张,所收票价随即送交收支所,领取收条
兑彩所	7(委员 2, 司事 4, 识字 1)	每月开彩后,俟管票所提出中彩票根,标挂正彩兼中一字二字对尾表,牌示开兑日期,兑换彩银
核票所	5(委员 1, 司事 4)	以 1 名料理(网)簿,以 3 名分销省内外缴会已兑彩之红票,按期数、彩数逐张逐条核竣,编立号簿存查

收支所共设人员编制 4 名。其中,委员 1 员,经管本所银钱出入及造报一切等事;总帐司事 1 名,经管收支各款帐目;帮帐司事 1 名,缮写出入现银各帐;另外,还设管银钱司事 1 名。章程规定,该公司无论收支何款,均由帐目司事核算开单,交银钱司事覆实、收发。如系收款,即刻出具印收,送交银号入折存储,委员验折盖章;如系支款,呈由委员司事各盖章持折往取。至于各期彩银开彩后数日兑彩,兑彩所委员亲书印票加盖图章将银取出。次日开兑,支银若干,逐日开单报查,半月册报一次。省外已中未发之彩银,缴回公司存留待发,此项彩银另折存储,另帐登记,不与票价相混,如一年期满无人持票请领,此项中彩之票即作废纸。又省外中彩有到是省内兑彩所领取者,此项即为垫支,俟省外缴回未发彩银,即行拨还归款,年册报。如有余银听候提拨。每月票价收支各款,总结后呈递手折,并以一份移知藩司。经费收支各款,按月造册详报。各期票价彩银何日收支清楚,即造册呈报。每期发票数目于开彩后登日报一次。省外各期票价照章一期一报,两期一解,如未缴清,即行札催,以重公帑而免久延。

文案所共设 3 人,其中委员 2 员、司事 1 名,经理上行、下行、平行公牒及各处信电各件。文案所每日收到公文册报,先送总办阅过,随即分送收支、管票、核票等所查核有无(桀)错,再行拟批拟稿汇呈提调总办核定、施行,并以一人兼司核对。收发文件,则归司事一手经理。

编核所因工作最为繁杂,故设有人员 26 名,其中委员 2 员、司事 24 名。其中,以 19 名编印每期彩票号码;以 4 名按日核对编成之票,核毕交由委员逐

张查核,无讹仍交由原印之司事送交管票所点收,掣取收条备查;由于编核所内事务繁重,再于司事内选举 1 人领班,专管印造所交来白票,并随时照料一切事宜;以 1 名兼理编号需用之胶墨;以 1 名收掌彩物一切什物并彩球彩子等件,每期开彩前数日清理彩筹各件。彩号各子均照号数次序挨次用铜签贯串,由总办派各委员清核,复由提调抽查无误,用木箱盛储,临期运赴彩场应用。其彩场员司执事于开彩前一二日呈递执事清单,由总办遴派阁局员司经理,以昭郑重。

管票所共设 5 人,其中委员 1 员、司事 4 名,分管收发票张及省外各处来往函件、凭单、发单(网)簿,清提中彩票根,及核算中彩银数等事。每期分发省内外各售票所彩票 3 万张,由各售票所照章发商销售。省外售票所系由各署局兼办,共 29 所,公司附设售票 1 所。各所申解票价,迳由收支所核收,所有各所禀请认商、退商及增减票额,由委员请示酌办。

售票所设 4 人,委员 1 员、司事 3 名。经管省内给领各商票张,所收票价随即送交收支所,(领)取收条。各商应得九三四五等扣款,则视领票之多寡而定。此项扣银准由票价内坐扣,至发出票张、收进银元,按期缮具月折,呈总办提调查核外,均另备有簿据存查。

兑彩所共有 7 人,其中委员 2 员、司事 4 名、识字 1 名。每月开彩后,俟管票所提出中彩票根,即标挂正彩兼中一字二字对尾表,并牌示开兑日期。预前一日,委员亲书取银印票,加盖图章,到收支所将银取出。次日开兑,事极纷繁,支用若干,按日开报。前五彩及尾彩,由委员亲核票根,如无讹误照数发给。自第六彩以至对一字尾、二字尾彩,各司事分手兑给,收回红票,逐一核销,五日汇交核票所核查。如本期有领上期之彩者,须俟本期发过五日,始行支发,俾免混淆;红票亦由各司事收回核销。如至半月,则不论本期上期均汇交核票所稽核,设有□错,惟经手司事是问。支出银圆,收回红票,由委员互相稽查。

核票所有职员 5 名,其中委员 1 员、司事 4 名,司事以 1 名料理(网)簿,其余 3 名分销省内外缴回已兑彩之红票,按照期数、彩数逐张逐条核竣,编立号簿存查。

四川彩票总公司设置了较为完备的彩票发行机

构,而这一切出现在其时交通未便的内陆省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代彩票市场由舶来品充斥到以本土化为主流,由沿海沿江延伸到内陆边陲,由借义赈之名到以善后、新政为名目的筹款,由单纯的变资助赈到日益商业化运作的演变轨迹,这同时也是晚清彩票由简单、零星、无序逐渐走向彩票发行制度之建构的尝试过程。

三 四川彩票总公司的运营机制

中国近代彩票的经营体制从广济公司开始,就一直按照外国通例采用商办之法。地方督抚虽为公司撑腰,但只管按期接受利润而不太过问彩票的经营,彩票商通常以一成左右利润作为报效。这种方式于官方而言,可以省去发行彩票的繁杂以及避免经营上的风险,但所得利润也因此受限。官办彩票则官府业务增加,且需面临经营上的风险,但所有盈余尽收府库,利益可观。张之洞创湖北签捐票,首开中国近代官办彩票之始,“事事以官法部勒之,而局面为之一变”^{[5]4893}。风影随从,之后,各省也纷纷开办官办彩票^⑦。

下面仅以《四川彩票章程》的规定^⑧管窥四川彩票总公司运行机制的构建情况。

四川彩票总公司属官方主办,“总部设在省城成都,由官厅派员负责”,试用道熊承藻充任四川彩票总公司总办,会办则是“花翎二品衔调川差委浙江候补道”。彩票公司主管人员的在商与在官身份,是商办彩票与官办彩票的显著区别。而市场经销中的行政干预则是四川彩票公司官办属性的又一特色。为确保销售,四川彩票总公司禁止一切他种名目的彩票,“四川通省各属,自本公司奏准开办日为始,凡有商民人等开设彩票及名非彩票而与彩票情形相同者,不论曾否禀准有案,一律禁止。如违私设,定行严究”。这是该公司欲利用行政力量而实行的一种彩票垄断之策。此外,四川彩票公司还责成“各该厅州县原有之货土、盐、电各局遴委委员开单,札由该公司转饬兼办公司售票所事务”,从而迅速形成密布全省的销售网络。此实为依仗行政之力以保官办彩票行销的强制之举。官办性的最大特点是行政权利决定一切,这不仅表现在人所周知的企业内部经营的封建官僚性上,而且在于其产品市场的行政化。地方官的权力有多大,产品的销路就有多广。企业主办者势力范围所及之处,尽为其所属企业产品的当然市场,官方甚至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强迫人们接

受。四川彩票总公司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彩票经营究属市场行为,单靠行政力量是不足以维系其发展的。在逾越了行政势力之外的市场领域,就不是四川彩票总公司可以凭借官方行政力量所能左右了。因此,四川彩票总公司在彩票的销售上主要还是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章程明确规定:“本公司虽系官督官办,然既经认照商规办事,凡经理公司事件及分设售票所大小各官员,其权限均与寻常商立各公司经理人无异,如有违碍公道营私舞弊实迹者,准各该彩商赴督部堂或商部控诉,以平商权而肃彩政。”

商业化运营首要的在于确立市场信誉度。为此,四川彩票总公司特别强调“信实”为公司之宗旨、根本。其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办事“悉照商规,力除官样”,且以“信实”为“建立公司之根本,推广销路之枢纽”。为确保“信实”,公司首先防止、杜绝彩票的伪造,章程专设“防伪”一条。规定:“制造彩票时,选料加工不惜重价,务极精致,刷印则关防严密,号码则权对审慎。同时,还邀请名望绅商特别鉴许,设有伪造,一览便知,准即送交地方官,比照私铸例治罪。”^[11]其次,为示“昭信”,四川彩票总公司特申明:每次开彩日期及中彩票数、银数,均照章于票面、票背分别刊示。万一彩期已届,票张尚未售毕,票价尚未收齐,仍照原定日期,在宏敞明显、公众能见之处安设坛座,恭迎督军宪临场开彩,本公司决不借词展缓彩期,减折彩银。最后,为避免本公司职员利用职务之便营私作弊,章程还特别设置“避嫌”一项,“凡本公司办事各员司,及分设各票所各该委员,一律不许购买四川彩票,如有隐名私购者,即或中彩,概不兑银”。

对于票额的设置,四川彩票总公司的方针是以“销数之盈绌”决定“票张之多寡”。第一次制票2万张,“以资试办”。待得调查各埠销票情形,“逐次相机推广”,但又以“增至额票五万张为限”。票价则根据彩票销售区域的不同,规定在川省之内,彩票票价以四川官铸龙圆为准,单张定价5元;而在川外,则以该埠通行之银圆照收照付。彩期采取通行的期限,月开彩一次。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905年12月)为第一次开彩之期;嗣后,每月择日开彩一次,并先期一两月登报布告。设想倘若销场踊跃,则于六、腊月照开双彩。

为了鼓励川民踊跃认购彩票,四川彩票总公司

特别就发行该彩票旨在“济公”之需给予申明：

川省库储支绌，而练兵制械需款浩繁，督部堂軫念民依，不欲以苛派细捐重累蜀中父老。惟彩票一端力籍众擎，义归公益，深得聚民散财之遗意，抑亦便商裕课之良筹。况邻省签捐内灌不少，民间彩胜私设尤多，体察輿情，不难举办。爰资除羨以济要公，但除发彩、扣用及公司经营外，为数已属无几。该商民等须知，意原因利，事异募捐，当能踊跃争先，以仰慰督部堂恤民艰舒用之苦衷也。

彩票的销售，四川彩票总公司采取“售现不售欠，售趸不售零”，分行批发，并以40张为起码，一律见银交票，“不得丝毫蒂欠”。凡曾经公司注册各彩商，均于开彩之先期一月备齐票价，赴原立凭单之各该售票所，如数领取票张。关于认领彩票商的资格，公司规定，不论绅富士民，凡身家殷实者，均许认领彩商，开设行号，领销本公司自制彩票。成都省垣及所属各府厅州县，凡有本公司分设售票所者，迳赴该所，遵式立具正、副凭单，注明每次认销票张若干，转报总公司注册，以便按月照单分派。其未经设有售票所之各该州县，如果有商情愿设分行领销票张，准赴地方官衙门具呈转报，由公司酌量推广，遴员经售。倘各该行因事甘愿退商及须增减认销票额者，则均需一律赶前二期未经开彩之先报到本公司。

折扣的大小，是决定票商销售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对于批量领取彩票以兹售卖者，公司给予“扣用”作为酬薪，以资鼓励。根据其时彩票市场之行情^①，《四川彩票章程》规定：

凡销票至40张以上者，以九五扣作酬，300张以上者，以九四扣作酬，600张以上者，以九三扣做酬。均准由票价内如数照扣清楚。全年并计双彩共十四期，凡有资本200元者可获利140元，有资本1500元者可获利1260元，有资本3000元者可获利2940元。

彩票在发递、申解、兑换的过程中所需耗费的承担，四川彩票总公司认为，若概由本公司认给，则综计出入，为数过巨，碍难办理；若累及售票所，各员司

热心募劝，售票较多者赔款费较重，不符公道。因而特议定：除成都不计外，凡彩行购票100张，随缴邮资洋2元。其理由在于：“各分行扣用已丰，认此薄费不足为累。至票价及彩银解兑各费，统于得彩诸公名下，按三分摊扣，九牛一毛，所费无几。因而所有公司分设售票所，凡寄票、缴价、兑彩三项运费均在邮资及三分彩扣项下分别支销。”

彩票销售之后的兑彩一节，是最为购彩者所关注期待的。为了保障兑彩的顺畅，四川彩票总公司章程规定：中彩号码以公司对号单为凭，前五彩及尾彩均于开彩次日电传各埠，登报新闻。兑取彩银，均认票不认人，迟早听便。照鄂票（指湖北签捐票——笔者注）例，从开彩日起予限一年，逾期该票作废。前五彩及尾彩款目较巨，均由成都本总公司兑取，其余各彩酌量于本公司分设售票各所就近划付，以期便商。中彩红票设有纸张破烂、字迹涂抹及骑缝号戳不符者，概不给彩。

从宗旨的确定，到票额、票价、票张的设定，领商认售的条件，筹运的过程，兑彩的规定以及彩票收益的支用，四川彩票总公司都在其彩票章程中给予了明确规定，展现出晚清四川彩票总公司由创设到运作的成熟而完备的运营机制。这不仅从一视角展示了晚清彩票的运行机制，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至四川彩票总公司成立时晚清彩票业已发展到了一个较为成熟完备的阶段。

事与愿违的是，就在四川彩票总公司发行官办彩票不久，晚清政府为挽救其江河日下的颓废之势而实行“新政”，彩票作为“迹近赌博”、“有碍实业”之业而遭遇新政中以江苏谘议局为首的“禁绝”之议，在新政的面纱下，晚清当局也不得不略顺民意，要求各省督抚禁绝彩票。加上四川彩票总公司成立之时，已是晚清中国彩票市场几近饱和之时，彩票也由最初的为义赈而兴，得民众首肯，演变为一种变相的聚敛财富、搜刮民财之手段，因而遭遇到社会舆论的一致呼禁。故而，四川彩票总公司在晚清的彩票市场上并未发挥出与其完备的机构设置以及完善的章程规定相适应的功效。

注释：

①相较于沿海地区随吕宋票而兴的各色小票，四川的货物小彩票出现时间略晚，但这也只是依照现有的档案资料而言的，同时也是受四川地处内陆交通未便的结果。

②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全宗号6，缩微号46，档案号5211。

- ③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全宗号6,缩微号46,档案号5211。
④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七、十二、十三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全宗号6,缩微号46,档案号5212。
⑤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明清第一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案卷号:44(胶片),文件号:2979。
⑥明清第一档案馆藏:川督档案,胶片号79,案卷号409。
⑦在上海,起初为官督商办的江南义赈彩票,至1905年改为“南洋筹捐官彩票”。
⑧以下引文均来源于《四川彩票章程》,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全宗号6,缩微号47,档案号5216。
⑨其时彩票公司大多给予经销商以九五折批得彩票,签捐票以九二折价格从优。

参考文献:

- [1]刘力.道德价值转型下的晚清彩票[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7,(1).
[2]刘力.赈灾彩票:传统道义的近代关怀[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
[3](四川)彩票停缓[N].大公报,1902-07-15.
[4]川中亦兴彩票[N].申报,1906-01-31.
[5]徐珂.清稗类钞:第10册[G].北京:中华书局,1986.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Sichuan General Lottery Corporation During Late Qing

LIU Li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Journal of CNU,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tant archives, an examination as well an introduction is made of the regulations of Sichuan Lottery Constitu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Sichuan General Lottery Corporation, to show the building attempt at the realization of lottery-issu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o reveal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 lottery developing from a simple, fragmentary, disorderly one to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lottery-issuing institution; Sichuan General Lottery Corporation; Sichuan Lottery Constitu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